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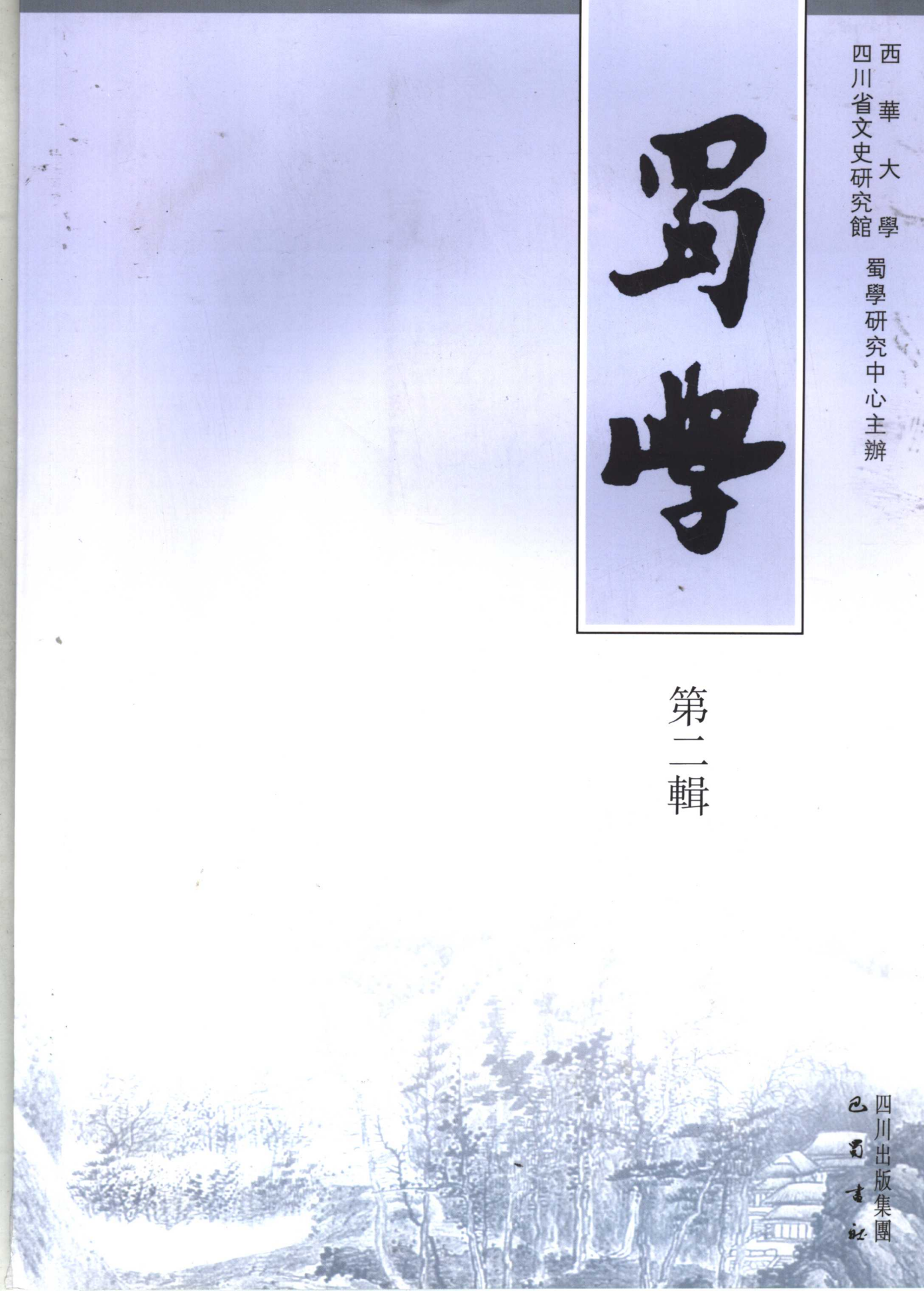
西華大學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

蜀學研究中心主辦

蜀學

第二輯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西華大學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
蜀學研究中心主辦

蜀學

第二輯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蜀學. 第2輯/西華大學,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 蜀學研究中心主辦. —成都: 巴蜀書社, 2007. 11

ISBN 978-7-80752-062-7

I. 蜀... II. ①西... ②四... ③蜀... III. 四川省—地方史—古代—文集 IV. K297.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7) 第 164335 號

SHU XUE
蜀 學 (第二輯) 西 華 大 學 蜀學研究中心 主辦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

責任編輯	周田青
封面設計	文小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028) 84122206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印 張	20.25
字 數	470 千字
書 號	ISBN 978-7-80752-062-7
定 價	45.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蜀學》編輯委員會

顧問：羅中先 張在德

主任：曾德祥

副主任：鄒禮洪 康濟民

編委（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文才	安 山	李大明	李 誠	祝尚書
胡昭曦	施維樹	紀國泰	陳國先	徐志福
張 帆	張志烈	張建鋒	康濟民	曹方林
曾加榮	曾紹敏	曾德祥	馮廣宏	項 楚
鄒禮洪	遲乃鵬	龍 晦	鍾興明	謝桃坊

主 編：曾德祥

副主編：謝桃坊 鄒禮洪 遲乃鵬

《蜀學》第二輯發刊祝辭

盼望已久的《蜀學》輯刊第一輯於二〇〇六年九月問世，實現了蜀中幾代學者的心願。現第二輯也與讀者見面了，我們為之感到欣慰與振奮，這預示着蜀學研究的振興和繁榮。蜀學自西漢初年興起之後即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具有明顯的地域學術特色，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然而由於長期以來對蜀學缺乏整體的認識，亦未系統地研究，尤其有不少的經學家、哲學家、史學家、文學家和科學家的學術價值尚待發掘，而且研究力量分散，以致蜀學這一資源的價值、意義未能充分被人們認識和弘揚。弘揚蜀學是我們蜀中學者義不容辭的任務。

蜀學屬於高層次的學術研究，也最能體現四川的文化傳統精神。我們要闡發蜀學的成就，繼承蜀學傳統，同時要以高水平的學術成果豐富當代的蜀學，並希望以此推動四川文史的學術研究和提高學術水平。

蜀學研究的開展必然促進蜀學的普及工作，讓四川悠久而優良的文化學術傳統為人們所了解：一些傑出的文學家一到中原即改變時代文風而被推為文宗，不少學者是新思想的倡導者或儒學正統的維護者，還有正史的典範作者和斷代史的優秀史學家、近代維新變法的著名人物，以及現代衆多的第一流的學者等等。他們建設了蜀學，爭得了蜀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這必將增強四川人民的文化自信，鼓舞四川人民嚮現代化的宏偉事業前進，對於推進四川建設文化強省具有重要意義。

《蜀學》輯刊的創辦，旨在團結蜀中學者、蜀籍學者和研究蜀學的學者共同為振興和發揚蜀學優良傳統而作出貢獻。輯刊匯聚的是蜀學的研究成果，保持的是傳統的地域的特色，努力以此確立蜀學在中華文史研究中的地位。蜀學研究中心還將對蜀學研究的重點和選題進行規劃，有步驟地推進蜀學研究的深化和進展。

西華大學和四川省文史研究館共建的蜀學研究中心已歷三年，匯聚學術力量、彰顯學科特色、提升學術水平、推廣學術成果已見端倪。我們正在努力使之成為中國研究蜀學的基地，要堅持將《蜀學》輯刊辦下去，希望學者們共同來開墾和耕耘這新的而又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學術園地。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會在這園地裏見到百花競艷、枝繁葉茂、碩果纍纍，充滿了旺盛的生命活力。

羅中光

二〇〇七年九月五日

目 錄

論蜀學的特徵	謝桃坊 (1)
蜀學淺議	查有梁 (15)
四川國學院述略	楊正芭 (20)
成都尚友書塾史述	劉伯毅 劉器仲 (26)
我所知道的私立尊經國學專科學校	劉雨濤 (32)
薛煥與王闔運——尊經書院研究之二	龍 晦 (34)
蜀學後勁——李源澄先生	蒙 默 (42)
廖平經學述略	黃開國 (53)
論劉咸忻的國學教學思想與方法	謝惠鵬 (61)
白敦仁先生學行述略	張志烈 (69)
古蜀魚崇拜與蜀人東進	屈小強 (80)
三星堆祭祀坑文物探源	姚思源 (89)
讀顧頡剛先生《論巴蜀與中原的關係》	張繆斯 (97)
揚雄“莽大夫”身份考論	紀國泰 (106)
論揚雄的賦體雜文	劉洪仁 (116)
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論	馮修齊 (123)
論晚唐詩人唐求	王定璋 (131)
邛崃才女黃崇嘏考	張紹誠 (139)
論李香巖手批紀評蘇詩	曾棗莊 (145)
呂陶的“簡易”思想述論	官性根 (155)
黃庭堅成都府路遺迹考述	張邦煒 盧俊勇 (163)
山谷詩集蜀中三注家事迹考證	張承鳳 (175)
魏了翁經學著述考略	彭東煥 (181)
論魏了翁壽詞創作的文化背景	張 帆 (196)

明代成都的官學、書院和方志編修	張莉紅 (202)
楊慎詩歌美學思想初探	李昌雲 (212)
安磐的詩歌美學觀初探	曹方林 (223)
談費密的《弘道書》	劉鋒晉 (228)
李調元詩歌美學思想初探	鄭家治 (232)
初論郭沫若對蜀學傳統的繼承	曾加榮 (241)
論郭沫若的文化精神	陳鑒昌 (247)
試論劉光第“爲世有用”的治學思想	鄒禮洪 (256)
《寒夜》人物談	徐志福 (265)
論張瀾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其對現代教育的啟示	何 寧 (272)
四川方音在宋代以後的發展	彭金祥 (277)
西蜀仙學	馮廣宏 (288)
試論蜀人的仙化思維	鍾文華 (295)
蜀學史料	伍 文 (301)
自 述	劉咸炘
宋代蜀文輯存序	傅增湘
四川南部縣府清代文書之發現及其意義——四川省文史館南部文書考察紀略	(307)
蜀學研究中心工作會議紀要	(316)

稿 約

論蜀學的特徵

謝桃坊

四川的學術是在西漢初年開始發展的，它在淵源、體系、思想和方法等方面都屬於中國學術的一部分，但因四川特殊的地域文化和歷史條件却又使四川的學術形成某種地域特色，在中國學術史上被稱為蜀學^①。蜀學的傳統頗為悠久，在近代又吸收了新學而獲得新的活力，其文化特徵亦愈益顯著。關於蜀學的特徵，在學術史上雖有對蜀中某位學者或某個學術群體的評論，然而却缺乏總體的認識。1912年蜀中學者謝无量、吳虞談到“四川人自稱絕學者多”，當時劉師培在成都，亦以為然^②。1918年章太炎在四川考察後說：“余觀四川文化，通儒特起能名其家者不如下江，然人盡讀書，鮮有不識字之子，亦視下江為優。近世棒客（強盜）橫行，略及軍旅，行商大吏多受攻鈔，然愛慕儒先，相戒勿劫教員，化亦美矣。”^③謝无量和章太炎之論屬於直覺的經驗，具有片面性質，缺乏理性的概括。近世全面而認真探討蜀學特徵的是蜀中國學大師劉咸忻。他於1926年著的《蜀學論》裏追溯了蜀學的歷史與成就，以為“吾蜀介南北之間，折文質之中，抗三方而屹”，“蜀學崇實而不虛也”，“統觀蜀學，大在文史，寡戈矛之攻擊，無門戶之眩暎”^④。他於同年的《自述》裏關於蜀中學者說：“蜀中學者多秉山分阻險之氣，能深不能廣，弊則穿鑿而不通達。”^⑤以上的認識可以啟發我們對蜀學特徵作進一步探討。蜀學的特徵是蜀學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學術傳統所體現的，它必然受到中國學術思潮的影響。我們探討這個問題是非常困難的，很難處理學者個性與學術共性之間的關係，也難脫離中國學術思潮而孤立地論及學術的地域性。當我們以為蜀中學者自稱絕學者多時，而在中國其他地域也有這種情形；若以為通儒特起者少，則又可

① 謝桃坊：《蜀學的性質與文化淵源及其與巴蜀文化的關係》，《蜀學》第一輯，巴蜀書社2006年。

② 《吳虞日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 章太炎：《自定年譜》，《章太炎年譜長編》第582頁，中華書局1979年。

④ 劉咸忻：《蜀學論》，《推十書》第2100頁，成都古籍書店1996年影印本。

⑤ 劉咸忻：《自述》，《推十書》，第2124頁。

舉出如揚雄、蘇軾、楊慎、劉咸炘、郭沫若等學者而予否定；若以爲崇實而不虛，則又有許多長於理性思辨的學者，尤其晚清以今文經學在蜀中特盛。因此我們歸納的學術特徵，它在中國學術和中國地域學術之中僅具有相對的意義，即某個特徵可能在蜀學中存在其對立面而易被否定，也可能存在於中國其他地域學術之中，並非絕對的。然而若從中國學術發展過程來審視蜀學，則那些最具獨創性的並提供新的思想或方法的學者，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呈現某些共同的特點，由此顯示了某些地域性的特徵，我們歸納這些特徵則又是可能的。自兩漢以來，蜀中古今學者衆多，我們祇能選擇最具典型意義的學者試爲粗略地考察。

—

四川位於中國西南隅，四面險阻，却自然條件良好，物產豐饒，故被稱爲天府之國。它遠離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與時尚文化和學術新潮保持很大的距離；其文化與學術均呈現滯後的特點，因而與主流文化相較是有一定差異的，這是地域特點所致。時尚文化是不斷變化的，此起彼伏，追新務奇，以此推動主流文化嚮前發展。每當中國學術思潮處於轉型或出現某種偏離傳統傾向時，蜀中學者一到京都嶄露頭角，即以一種維護傳統的態勢力矯時弊，大膽革新，迅即成爲新思潮的倡導者，有的竟主盟文壇，被譽爲一代文宗。這些蜀中學者因其接受較爲恒定的學術傳統，能够客觀地冷靜地看待時尚文化，易於發現時尚新奇表象所掩飾的弊端。任何時代的統治集團總是在本質上堅持某種文化傳統，所以當蜀中學者指出時弊便可能得到統治集團的支持而發生學術思潮的重大變化。我們可見到蜀中學者司馬相如、陳子昂、李白、蘇軾、魏了翁、楊慎、吳虞等都具有堅持學術傳統並時據前沿，引導一代思潮的特點。

蜀中第一位學者當推司馬相如，他活動於西漢初年，自幼在成都接受了中原文化。他是辭賦大家。其《子虛賦》、《上林賦》和《大人賦》因辭藻瑰麗，氣勢宏偉，受到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賞識，成爲漢賦的典範作品，對後世辭賦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漢書·藝文志》著錄其賦二十九篇，重要作品今存。他的辭賦雖然誇飾鋪陳，但深寓現實的諷喻意義，歸於“正道”，而且表現了豐富的學識與文學的天才，開創了一代文風。唐代初年，文風趨於浮艷靡麗，這與唐王朝的國勢逐漸強大不相適應。光宅元年（684）武則天臨朝稱制，這時蜀中射洪陳子昂二十六歲，雖已登進士第而未入仕。他以“草莽臣”的身份呈上《諫靈駕入京書》，武則天雖未接受這個建議，却發現陳子昂卓越的政治見識，迅即召見，擢爲麟臺正字。陳子昂感到“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由此可展王霸之才，又上了《諫政理疏》，發表關於調養國家元氣的見解。他雖然具有政治和軍事才能，但歷史定位仍是文學家。其友人盧藏用說：“道喪五百年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陳伯玉集序》）陳子昂關於文學改革的思想，見於其《修竹篇並序》。他以爲自晉以來“文章道弊”，希望繼承“風雅”傳統，提倡“興寄”，

以發揚“漢魏風骨”。這實即在新的文化條件下，以恢復儒家詩教為號召，使文學關注社會現實，發揮應有的社會功能。他的文學革新主張是服從其政治觀念的，而且在創作中得以實現。從唐代文獻來看，陳子昂在文學上的影響還不是《修竹篇並序》，而是其系列的政論文和三十八首采用“興寄”的具有“漢魏風骨”的《感遇詩》。他的文學見解與創作雖然以復古面貌出現，而實有創新意義。中國詩史上盛唐氣象的代表者應是天才的詩人李白。他屬於漢代李陵之後，出生於中亞碎葉（吉爾吉斯的托克馬克附近），五歲時隨父遷居綿州昌隆縣（彰明，今四川江油），天寶元年（742）秋李白應詔入京，當賀知章讀到其《蜀道難》即嘆為“謫仙”。他的浪漫的傳奇故事，祇有在唐代開放的文化政策下纔可能出現。他的詩歌豪邁飄逸，氣魄雄偉，表現了一種積極的狂放的精神，為中國詩歌建立了新的範式。李白是繼陳子昂之後的文學革新者，在組詩《古風》五十九首中感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提倡“清真”、“天真”，反對“綺麗”、“雕琢”。他晚年在《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抒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中表達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美學理想。清人趙翼說：“其眼光所注，早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直欲於千載後上接風雅。蓋自信其才分之高，趨向之正，足以起幾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甌北詩話》卷一）陳子昂改革文學的主張未得到文壇的響應，李白以創作實踐改變了一代詩風，真正體現了盛唐氣象。唐代中期由韓愈、柳宗元發起的古文運動並未完成它的歷史任務，晚唐五代浮艷的文風至北宋猶有影響，而新的西崑體和太學體又甚為流行。天聖七年（1029）五月宋仁宗試圖通過科舉考試的途徑革除文弊，特發詔令云：“朕試天下之士，以言觀其趨向，而比來流風之敝，至於蒼萃小說，磔裂前言，競為浮誇靡曼之文，無益治道，非所以望於諸生也。禮部其申飭學者，務明先聖之道，以稱朕意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八）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禮部貢舉，以新的散文標準取士，而蜀中眉山的蘇軾、蘇轍兄弟中進士第。《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稱他“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名聲赫赫，動於四方。”蘇軾遂以雄視百代之才出現於文壇。歐陽修從歷史經驗中看到文學的權威人物主持文壇操持文柄的重要性，將主盟的重任托付蘇軾。這樣，蘇軾成為北宋古文運動後期的盟主，鞏固了取得的勝利，完成了歷史任務。蘇軾在學術、詩歌、散文、詞體、書法、繪畫等方面均是開宗立派的人物，對宋代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南宋的文化主潮是理學，但理學的命運却是坎坷的，它遭到排斥，慶元元年（1195）韓侂胄執政，攻擊道學（理學）之論漸起，次年八月朝廷宣布禁黜道學，稱之為偽學，道學家們受到政治迫害。在理學上升為中國統治思想的過程中，魏了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魏了翁於慶元五年（1199）登進士第，嘉定五年（1212）丁父憂在家鄉蒲江創辦鶴山書院，開門授徒，講義理之學。嘉定八年（1215）他上疏朝廷《奏乞為周濂溪賜謚》，認為北宋理學創始人周敦頤為儒學之正傳，程顥、程頤親得其傳，“俱倡明絕學，有功於斯道”；此外朱熹和張栻又得濂洛之傳。為弘揚儒學，倡明聖道，請為他們賜謚。他的建議得到朝廷的採納，遂使慶元禁偽學以來，理學得以恢復名譽。魏了翁又不斷提倡理學，闡明理學道統，於《成都府學三先生祠堂記》說：“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圖著書，本於《易》之太極，子思之誠，以

極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本之以中正仁義，貫顯微，該體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孔子、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燦然大白於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斯焉。”（《鶴山集》卷三八）從此，理學為統治者重視，成為此後數百年中國的統治思想。蜀中最淵博的學者當推楊慎。新都楊氏為大家族，楊慎雖然出生於京都，但多次迴到故居看望祖輩，祭掃祖墓，家室亦留祖地。其學涉及經學、小學、諸子學、史學、地理學、金石學、文獻學、生物學、藝術學、詩學、詞學，今存著述百餘種。楊慎學識博雜，富於創新，破除門戶之見，具有求真窮理的態度。梁啟超談到清代學術思想說：“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幟志者也。……其啓蒙運動之代表人物，則顧炎武、胡渭、閻若璩也。其時正值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後，學者習於‘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理學家不復能繫社會之信仰，顧炎武等乃起而矯之，大倡‘捨經學無理學’之說，故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而若璩辨偽經，喚起求真觀念，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①這種求實學風的興起，如果追溯淵源則應始於楊慎。他治經學以小學的文字、音韻、訓詁為途徑，兼采文史雜書，攻擊宋明理學，同時亦不墨守漢學。周中孚說：“升庵精於考證，說經之書，俱能引據確鑿，獨申己見，殊勝於株守傳注，曲為附會者。”（《鄭堂讀書記》卷二）楊慎評明代學術云：“今之學者循聲吠影，使實學不明於千載，而虛談大誤於後人也。”（《升庵文集》卷七五）他大力提倡實學，為清代實學之先聲。因楊慎是在謫戍的困難條件下著述的，學術範圍廣闊，考證偶有失誤，在明代即遭到陳耀文和胡應麟的攻擊，然如周中孚所評：“二家所駁，亦互有得失，由所學在升庵之下，故未能平心考檢，以折其角也。”（《鄭堂讀書記》卷五五）楊慎在解放學術思想，轉變一代學風方面是起了作用的。中國近世戊戌變法之後，吳虞是“成都言新學之最先者也”^②。吳虞，字又陵，新繁人。青年時代在成都尊經書院學習，1905年留學日本，學習法學與經濟學。他迴國後在成都發表多篇批判儒學的論文，1917年1月至7月在《新青年》雜誌連續發表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禮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主義本於老子說》、《讀荀子書後》和《消極革命之老莊》；1919年於《新青年》第六卷六號發表《吃人與禮教》，從史實到理性批判，揭露了封建禮教的罪惡。這使他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激進人物。胡適稱他為“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並概括其歷史意義說：“他的非孔文章大體都注意那些根據孔道的種種禮教，法律制度，風俗。他先證明這些禮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禮教和一些坑害人的法律制度。他又從思想史的方面，指出自老子以來，也有許多古人不滿意於這些吃人的禮制，使我們知道儒家所極力擁護的禮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到思想家的批評與攻擊了，何況在現今這種大變而特變的社會生活之中呢？”^③我們從蜀中的司馬相如、陳子昂、李白、蘇軾、魏了翁、楊慎、吳虞等文學家

①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3頁，商務印書館1944年。

② 廖平：《駢文讀本序》，《蜀報》1910年9月，第一卷第二期。

③ 胡適：《吳虞文錄序》，《胡適文集》（2）第60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和學者對中國文學思潮和學術思潮的轉變所發生的作用來看，蜀學是具有固守傳統而又時據學術前沿的。

二

公元前 316 年秦國滅蜀，古代巴蜀文化消失，秦王朝嚮西蜀大量移民，建立郡縣制，移植中原文化。四川在學術思想淵源方面具有三個特點：一、因遠離中原王朝，每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在此地域相對薄弱，與主流文化保持着較大的距離；二、自西漢初年儒家經典在文翁興學後傳入西蜀，儒學畢竟缺乏牢固的根基，因而歷史上除了魏了翁等極少數而外，純正的儒者甚為罕見；三、西蜀是中國道教的發源地，道家思想給予學者很大的影響，以致常見陽儒陰道的現象。在如此的學術土壤裏，四川學術史上常見一些學者具有雜學的特點和異端的色彩，甚至以絕學自矜，例如揚雄、譙周、趙蕤、龍昌期、蘇洵、唐甄、李宗吾等。他們的思想與學說往往遭到正統學者的批判與否定，或統治階級的排斥與撲滅，但我們追尋歷史留下的綫索仍可以見到它們的思想光輝。

西漢末年的揚雄，其先世於元鼎（前 116—前 111）間由中原遷居西蜀郫縣。他雖然以辭賦見知於漢成帝，而歷史的定位應是一位大學者；著有《法言》、《方言》、《蜀王本紀》和《太玄經》，涉及若干專門學科。其最重要的著作是今存的《太玄經》十卷。這是一部奇書，《四庫全書》列入術數類。全書由經與傳組成，經部分為八十一首，每首四重，稱為方、州、部、家；每首九讀，為七二九讀，加畸、贏兩讀，共為七三一讀；兩讀為一日，計為三六五日又二分之一日，相當於一年的時間；關於八十一首的解釋為“玄首都序”。“玄”是最高哲學範疇，包涵了天地人及萬物之本源，其演繹以複雜的數序和諧排列，又具有高深微妙的哲理思辨。自漢代以來，不少學者對《太玄經》作過研究，但都難以讀懂。唐人王涯說：“當世俗儒，拘守所聞，迷忽道真，莫知其說，遂令斯文幽而不光，鬱而不宣，微而不顯，師法殆絕。道之難行也若是，上下千餘載，其間達者不過數人。”^①《太玄經》雖是用於占卜的，但並非沿襲《周易》，而是另有創意；其占卜方法、數理邏輯結構及所含蘊的玄妙哲理，學者們至今難以理解。三國蜀漢學者譙周，西充縣人，耽古篤學，精研六經，兼知天文；著有《法訓》、《五經論》、《古史考》、《論語注》、《五教志》等均佚。蜀漢後期譙周提出兩項政治主張皆遭到許多史家的批評，這就是反對北伐中原和勸劉禪迎降。北伐中原以求蜀漢政權的生存，此乃諸葛亮所定的戰略，但多年的戰爭以致蜀中百姓凋瘵。譙周為此與尚書令陳祗辯論，特作《仇國論》，以為“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三國志》卷四二）蜀漢景耀六年（263），曹魏大軍攻入蜀境，鄧

^① 王涯：《說法》，《太玄經》卷首附。

艾前軍已入陰平，後主劉禪召群臣會議以定計，譙周反對降吳與入南，講明時事利害關係；最終劉禪接受譙周的建議而降魏了。晉人孫綽評云：“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三國志》卷四二注引）從歷史來看，割據蜀中的王國必然是在中原戰亂之際，而當中原出現統一全國之勢時，蜀中的偏安政權是不可能獨立存在的，統一為歷史的必然。譙周能審時度勢，表現出的政治遠見，為後來西蜀處理與中原王朝的關係留下了非常有益的史鑒。唐代開元四年（716），蜀中鹽亭學者趙蕤嚮唐明皇進呈其著作《長短經》九卷，自稱“唐梓州郪縣長平山安昌巖草莽臣”。古代《戰國策》乃記錄縱橫家史事，此書曾又名“長短”。趙蕤之著乃講治國安邦的謀略，有縱橫家之意，故名《長短經》。其《儒門經濟長短經序》是一篇傑出的政論文，言其著述之旨云：“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設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夫霸者，駁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扶顛定傾，其歸一揆。”（《長短經》卷首）他主張治國應隨時設教，實行霸者之政，纔能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他雖自稱“儒門經濟”，實為道家、法家與縱橫家之混合的政治思想，尤其講究統治的權術，具有深遠而實際的識見。他在《長短經》中每論一事，皆先引諸子之說，證以古代史事，最後將歷史經驗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展示了經世之才。《四庫全書·長短經提要》評云：“雖因時制變，不免為事功之學，而大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這應是蜀中經世之學的淵源。後魏關朗作有《易傳》，趙蕤為之作注，今存《關氏易傳注》一卷。趙蕤的思想直接影響了詩人李白。北宋初年西蜀出現了一位異端思想的學者龍昌期。他是西蜀陵州（四川仁壽）人，著述甚多，計有《周易祥符注》、《尚書注》、《春秋正論》、《論語注》、《政書》、《道德經注》、《陰符經注》、《八卦圖精義》、《帝王心鑒》、《入神論箋書》、《三教圓通論》等，均佚。其學涉及儒家、道家、兵家、數術、史學，極為廣博。名臣文彥博在少年時代隨父游宦蜀中，曾從學於龍昌期。他後來在《送龍昌期先生歸蜀序》裏說：“君平先生，陵陽人也。藏器於身，不交世務，閉關却掃，開卷自得。著書數萬言，窮經二十載，浮英華而沈道德，先周、孔而後黃、老、楊、墨塞路，辭而辟之，名動士林，高視兩蜀。遂不遠萬里，上書公車，累叩天闕，久而不報，乃喟然嘆曰：‘道未亨矣，吾其歸歟！’”（《文潞公集》卷十一）嘉祐四年（1059）龍昌期已是八十九歲高齡，將著述百餘卷進呈朝廷，仁宗皇帝召朝臣審閱。朝臣認為龍昌期詭誕穿鑿，竟指周公為大奸，要求下令益州，毀其版本。朝廷因文彥博之力諫，賜龍昌期五品服並絹百匹。龍昌期携弟子十餘人到闕辯解，但遭到歐陽修和劉敞彈劾，於是朝廷追還所賜，遣歸西蜀^①。龍昌期被視為屬於異端思想的罪名主要有兩點：一是以周公為大奸，一是以六經無皇

① 吳天墀：《龍昌期——被埋沒了的異端學者》，《吳天墀文史存稿》第159—160頁，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

道。劉敞《上仁宗治龍昌期學術乖僻疏》云：“臣等觀其穿鑿臆說，詭僻不經，甚至毀訾周公。”（《公是集》卷三二）在《尚書·金縢》裏記述周武王疾甚，周公告訴先王，許迄其身自代武王攝政，祝辭藏於金匣中。管叔、蔡叔流言誹謗，周公遂避居東都，與成王矛盾；後來成王見到祝辭，甚為感動，迎歸周公。龍昌期認為這是周公為了專政而玩弄的欺詐之術，所以周公是大奸。“三皇”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伏羲、神農、黃帝。北宋時邵雍認為《周易》中存在三皇之道，於是六經中有皇道存在。龍昌期從古史的觀點以為《尚書》裏沒有記載堯、舜以前的事，故“六經無皇道”（《嵩山文集》卷十三）。我們若從學理和史實來看，龍昌期的態度是求實求真的，但在當時被視為異端，並對之進行撲滅。約略同時的蘇洵也有異端傾向，他却較為幸運。嘉祐元年（1056）眉山人蘇洵携二子——蘇軾、蘇轍入京，將所著書二十二篇由翰林學士歐陽修進呈朝廷；次年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第，“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澠水燕談錄》卷四）。蘇洵通曉六經及諸子百家之學，雖名列古文大家，而實為特出的學者。今存《嘉祐集》十六卷，其中以《權書》、《衡論》和《幾策》稱著。《權書引》云：“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人之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為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為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為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為仁義之窮而作也。”（《嘉祐集》卷二）他談兵不同於儒家，也不同於兵家，在更高的理論層次論述用兵之道。其《衡論》探討遠慮、御將、任相、重遠、良才、用法、議法、兵制、田制，為執政者提供經世的權術。因而蘇洵具有古代縱橫家的學風，並非一般的學者。他對儒學是有深厚修養的，但采取了批判的態度。《周易》為儒家經典之首，為什麼古代聖人要著這部書呢？蘇洵以為：“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六經論·易論》，《嘉祐集》卷六）原來聖人是故弄玄虛的，因其道之神秘莫測，無法理解，遂讓人們以為神聖，儒家之道也就被人們尊崇了。這是在理論上對儒家之道的真相的揭示，並對其基礎的顛覆。自儒家亞聖孟子以來最重視義利之辨。《周易》乾卦裏說“利者義之和”，蘇洵闡釋說：“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利者義之和論》，《嘉祐集》卷九）什麼是“義”，它實即統治者的價值觀念，在它之上還有公平，因而片面強調統治階級的大義必然有違公平而違背天下之心；所以蘇洵竟以為“義”是聖人用來戕害天下民衆的工具，而實際上“利”重於“義”的。我們細究蘇洵的論著，縱橫家之風是其表象，而其思想是含有異端性質的。當時仁宗皇帝和歐陽修、韓琦等重臣對蘇洵十分寬容，可能因其二子名望甚高而未追究了。清代初年四川達州出現了一位思想家唐甄。他一生式微，貧困以終，著有《春秋述傳》、《毛詩傳箋合義》均佚；今存《潛書》九十七篇。關於

《潛書》之旨，唐甄說：“甄雖不敏，願學孟子焉。四十以來，其志強，其氣銳，雖知無用於世，而猶不絕於願望。及其用於遠游，厄於人事，凶歲食其糠粃，奴僕離散，志氣銷亡，乃喟然而嘆曰：莫我知也夫！不憂世之不我知，而傷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鬱結於中，不可以已，發而爲言。有見則言，有聞則言。歷三十年，累而存之，分爲上下篇：言學者繫於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繫於下篇，凡四十七篇；號曰《潛書》。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迹，近度今宜，根於人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非虛言也。”（《潛書·潛存》）唐甄的文筆流美，結合自己的人生體驗，進行深邃的理性思辨，表現出尖銳的政治批評和真切的人生感悟。他是主張事功之學的，批評新儒學者說：“儒者不言豆苗，以爲外務。海內之兄弟死於饑饉，死於兵革，死於虐政，死於外暴，死於內殘，禍及君父，破滅國家。當是之時，束身錮心，自謂聖賢，世既多難，己安能獨賢？”（《潛書·良功》）這從儒者個人與群體的關係立論，指出所謂“獨善其身”的自私與不可能。國君被尊爲“天子”，至高至聖，但唐甄指出：“治天下者惟君，亂天下者惟君。治亂非他人所能爲也，君也。小人亂天下，用小人者誰也？女子寺人亂天下，寵女子寺人者誰也？”（《潛書·鮮君》）中國高度的中央集權集於君權，因而國君既可能是治天下者，也可能是亂天下者。古代史家將亂天下的責任往往歸於權臣、小人、女子、太監，而他們正是國君所信賴的。這對於認識中國封建集權的本質及歷史教訓是有深遠意義的。“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這是唐甄縱觀古今歷史後作出的判斷，他解釋說：“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潁陽；光武帝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陽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爲之臣也。”（《潛書·室語》）他有此認識，所以在順治十四年（1657）中舉後曾任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知縣僅十月即被革職爲民。《潛書》的內容豐富，思想深刻，其許多見解“皆人所不及見，不敢言者，先生獨灼見而昌言之”（潘耒《潛書序》）。自《潛書》於康熙十八年（1679）初刊之後，被詆毀爲“縱橫長短之文”，但又經修訂增補而終於流傳，其思想光輝是難掩的。近世四川富順出了一位思想怪異的學者李宗吾，他創立了“厚黑學”，自稱“厚黑教主”。自1912年他發表一篇文章名爲《厚黑學》，一時引起轟動；1934年《厚黑學》在北平刊行後即廣爲暢銷；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3月4日又在成都《華西日報》陸續發表《厚黑叢話》，影響日益擴大。李宗吾說：“我讀中國歷史，發現了許多罅漏，覺得一部二十四史的成敗興衰，和史臣的論斷是完全相反的；律以聖賢所說的道理，也不符合。我很爲詫異，心想古來成功的人，必定有特別的密訣，出乎史臣聖賢之外。我要尋它這個密訣，苦求不得，後來偶然推想三國時候的人物，不覺恍然大悟，古人成功的密訣，不過是臉厚心黑罷了。”^①李宗吾生活於中國的亂世，使他對中國文化產生懷疑並進行批判，揭示古聖先賢及帝王的陰險虛偽，以事例說明他們人格的卑劣，尤其是歷史上的成功人物都是臉厚心黑的。在厚黑學下彙聚中國大奸於一堂，讓人們認清他們的本來面

① 李宗吾：《厚黑大全》第31頁，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

目。同時李宗吾對在社會中為生存而鬥爭的人們，教導他們以厚黑學作為適應現實、取得成功的經驗。厚黑學從荀子的性惡論出發，以利己的觀點，試用簡單的手段，最有效地達到個人的目的，因而它易於迷惑人們。李宗吾是以隨筆方式論述其學的，通俗而乏學理。我們從中國權術來看，它屬於權術的表層現象，從個人取得成功的經驗來看，它僅屬於簡單的細微末節。因此他在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之後提出的厚黑學，結果是傳統權術的糟粕，是應予拋棄的。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厚黑學又在東南亞及中國大陸作為一種通俗文化而流行。我們從蜀學的發展來看，厚黑學之產生在四川，它無疑是有着雜學異端傳統的。我們若將揚雄、譙周、趙蕤、龍昌期、蘇洵、唐甄、李宗吾等蜀中學者並觀，則他們的學術思想都有偏離正統的特點，並有異端的性質。歷史上的異端思想，它們的個體性質是不同的，其學術價值也是不同的，這還有待具體的評價。

三

中國學術探討純粹理性之學以魏晉玄學和宋明理學為著，但它們在蜀中並無多大影響，即沒有出現以思辨見長的玄學家和理學家。中國實學主要體現在以名物訓詁見長的儒家古文經學派，其極致則為清代乾嘉的考據學派，但這兩種治學方法在蜀中亦無顯著影響，即沒有出現過著名的古文經學大師和考據學家。我們縱觀蜀學的歷史，大多數學者是崇實而富於思辨的，往往通過對史實的考察而進入理性的探討，故有實而能虛的特點。西蜀因地域的偏遠與固守學術傳統，所以中原時尚文化所體現的學術思潮在此地的反響甚微。蜀中學者習慣採用由實到虛，虛實結合的一般的治學方法，這在常璩、吳縝、任淵、廖平、劉咸炘、郭沫若與賀昌群等學者的著述中有很明顯的表現。

晉代蜀郡江原縣（四川崇州）史學家常璩的《華陽國志》十二卷，記載晉以前的四川、雲南、貴州及甘肅、陝西、湖北部分地區的歷史和地理狀況，是富於首創意義的地方史志，提供了古代華陽地域的古史、政治、經濟、民族等極為珍貴的史料。常璩以史學家的態度，忠實於史實的敘述，對傳說、神話、史料等皆作了客觀的處理。特別是關於巴蜀古史的傳說，他雖然在《巴志》和《蜀志》裏作了較詳而系統的敘述，最後在《序志》辨析說：“《蜀紀》言：‘三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八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為蜀王因石牛以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橫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回三千歲。又云荆人鰲靈死，屍化西上，後為蜀帝；周葺弘之血變為碧珠；杜宇之魂化為子鵲。……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為怪異，子所不言，況能為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鵲之鳥，今云是嵩，或曰嵩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華陽國志》卷十二）這對相傳的揚雄《蜀王本紀》所記古蜀傳說作了理性的分析，以證其